

东吴史学文丛
丛书主编 王卫平 池子华

学步集

周书灿 ● 著



苏州大学出版社
Soochow University Press



东吴史学文丛

丛书主编 王卫平 池子华

学步集

周书灿 著



苏州大学出版社
Soochow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学步集 / 周书灿著. — 苏州: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14. 7

(东吴史学文丛 / 王卫平, 池子华主编)

ISBN 978-7-5672-0841-4

I. ①学… II. ①周… III. ①中国历史—古代史—文
集 IV. ①K220. 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59701 号



- | | |
|------|--------------------------------------|
| 书 名 | 学步集 |
| 著 者 | 周书灿 |
| 责任编辑 | 巫 洁 |
| 出版发行 | 苏州大学出版社
(苏州市十梓街 1 号 215006) |
| 印 刷 | 苏州工业园区美柯乐制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
| 开 本 | 700 mm×1 000 mm 1/16 |
| 印 张 | 15.25 |
| 字 数 | 290 千 |
| 版 次 |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
| 书 号 | ISBN 978-7-5672-0841-4 |
| 定 价 | 39.00 元 |

苏州大学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本社负责调换
苏州大学出版社营销部 电话:0512-65225020
苏州大学出版社网址 <http://www.sudapress.com>

总 序

苏州大学是国家“211 工程”重点建设高校和江苏省属重点综合性大学,其前身为创建于 1900 年的东吴大学。1952 年全国院系调整时,东吴大学与苏南文化教育学院、江南大学数理系等合并为苏南师范学院,同年定名为江苏师范学院,在原东吴大学校址办学。1982 年经国务院批准改名为苏州大学。迄今为止,苏州大学已是一所拥有 6 个校区、113 年办学历史的著名高校。

历史学是苏州大学的传统学科之一,其源头可以追溯到东吴大学时期。1952 年江苏师范学院成立之初,设历史专修科;1955 年,原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著名史学家柴德赓教授受命南下,创建了江苏师范学院历史系。

“文革”结束以后,历史系在学科建设、教学研究、人才培养、学术交流等方面均取得长足发展。在此期间,中国史中的太平天国史、江南社会经济史等逐步成为历史系的特色研究领域,出版了《太平天国在苏州》《左宗棠评传》《苏州手工业史》《六朝史》等颇具影响的学术著作;世界史教师也通力合作,先后编写了《世界古代史》《世界近代史》《世界现代史》《世界当代史》等系列教材,在高校历史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

继 1983 年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成功申报硕士点后,1991 年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并于 1994 年正式取得博士学位授予权。1993 年以后,中国近现代史学科还被江苏省政府列为重点建设学科。1995 年,结合苏州大学院系调整,历史系更名为社会学院。

现在的社会学院包含了 5 个系 8 个本科专业,而历史学系无疑居于龙头地位。进入 21 世纪以后,苏州大学历史学科的发展更为明显,学科建设和科研水平不断提高。2005 年,历史学被评为一级学科硕士点;2007 年,获评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2008 年,历史学专业成为江苏省品牌专业,中国古代史获评江苏省精品课程;2010 年,历史学被评为一级学科博士点,后因一级学科的变化,调整为中国史一级学科博士点和世界史一级学科硕士点。与此相应,中国史成为江苏省一级学科重点学科。而历史学科教师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每年均有斩获,成为科研中的一个亮点。

从“九五”时期开始,历史学科即参与苏州大学“211 工程”建设项目,并作出了积极贡献,先后出版了“苏南发展研究丛书”、“苏南历史与社会研究丛

书”、“吴文化研究丛书”等系列研究成果。在此过程中,我们积极落实学校“服务社会”的办学宗旨,努力服务于地方经济与社会发展,为各级政府部门既提供了有效的决策咨询服务,又承担了多项大型文化工程的建设任务,如:《苏州通史》(编纂)、“苏州文献丛书”(古籍整理)等;还构建了“江苏省吴文化研究基地”、“江苏省红十字运动研究基地”等重要科研平台。所有这些,都为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苏州大学历史学科的发展,源于长期办学的深厚积累,得益于学校领导及相关职能部门的大力关心和支持,更是与广大教师的辛勤耕耘、努力工作分不开的。为此,2012年9月,经历史学科诸同仁的充分商讨并得到社会学院的同意,我们决定编辑出版“东吴史学文丛”。“东吴史学文丛”收录了我校历史学科多位在职教授的研究成果,每位教授的成果单独成集。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各位教授的成长历程和治学特色。

在“东吴史学文丛”的编辑出版过程中,王玉贵教授付出了大量的劳动,苏州大学出版社的领导和各书稿责任编辑给予了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苏州大学社会学院院长
王卫平

目 录

Contents

古史传说与文明探源

大禹传说的流变与整合

——“层累说”的再检讨/ 2

鲧之传说的地域分野与鲧生高密的历史地理学解析/ 25

洞庭湖流域初期社会复杂化与文明化进程研究/ 35

庄蹻王滇与云南地区文明化进程初论/ 50

夏史新证

《穆天子传》“启居黄台之丘”考

——兼论周穆王东巡的地理问题/ 60

启征西河与夏代西河地望/ 72

太康——夏朝国家的真正建立者/ 83

河南新密市新砦城址中心区大型浅穴式建筑的性质再思考/ 95

商周史

从外服制看商代四土的藩属体制与主权形态/ 102

济南大辛庄商代遗址的性质问题/ 112

“民”“氓”语义转换及周代“氓”之身份考察/ 119

社会文化史

由姬姜姓族论及“周人尊夏”说/ 128

戎夏同源说续论/ 137

“氏族封建”说与先秦社会形态再思考/ 145

上博简《容成氏》九州补论/ 161

中国早期的四岳、五岳地理观念析疑/ 167

学术史

《殷周制度论》新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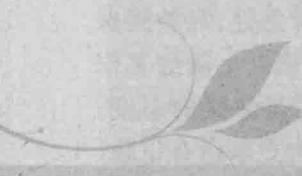
——学术史视野下的再考察/ 178

论郭沫若对罗王之学的臧否/ 191

论徐中舒的“澄滤”说与古史建设理论/ 201

论蒙文通上古民族文化理论建构/ 214

附录：主要学术论著简目(1994. 7—2014. 5)/ 231



古史传说与文明探源

- 一、大禹传说的流变与整合
——“层累说”的再检讨
- 二、鲧之传说的地域分野与鲧生高密的历史地理学解析
- 三、洞庭湖流域初期社会复杂化与文明化进程研究
- 四、庄蹻王滇与云南地区文明化进程初论

大禹传说的流变与整合

——“层累说”的再检讨

西汉时期杰出的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说：“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在司马迁看来，《五帝德》和《帝系姓》方有五帝的记载，但以上两部著作没有广泛流传，所以，其对于黄帝的各种传说采取的更多的是怀疑的态度。与此同时，司马迁强调儒家的经典著作《尚书》对尧、舜以来的史事已有记载，该段历史明显较黄帝时期的传说增加了不少可信的内容。尽管如此，司马迁还是一再告诫后人，其在各地走访过程中，所听到的有关五帝时期的大量传说，内容并不完全一致。司马迁在“书间有缺”〔1〕的情况下，结合自己的走访，“择其言尤雅者”〔2〕，勉强拼凑出《五帝本纪》。实际上，这位杰出的历史学家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的本意还不是要我们盲目地加以信用，而是提供一些较为可靠的线索，甚至包含自相矛盾的线索，等待着后人进一步实事求是地研究”〔3〕。但值得注意的是，继《五帝本纪》之后，司马迁在《夏本纪》中用了大量篇幅叙述了传说中的大禹时期的“历史”。自此以后一直到清代晚期，绝大多数中国学者确信，大禹是中国文明起源与国家形成过程中颇具重要作用的“信史”人物。直到顾颉刚先生受近代疑古思潮的深刻影响提出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4〕观，司马迁以来的传统观点才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动摇。自此以后，大禹和大禹文化一直是学术界普遍关注的重要话题。尤其近年来，夔公盔和郭店楚简、上博简的发现，使这一争论已久的话题，历经半个多世纪的沉寂之后，再度成为古史学界高度关注的学术热点之一。本文拟结合新出土考古学资料，对大禹传说的缘起及流变、整合过程加

〔1〕《史记·五帝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第46页。

〔2〕《史记·五帝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第46页。

〔3〕徐中舒、唐嘉弘：《〈山海经〉和“黄帝”》，《山海经新探》，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第98页。

〔4〕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努力周报》附刊《读书杂志》第九期，1923年5月6日。

以简单剖析,试图恢复该阶段历史的部分真实面貌。

一、山川神主:西周时期大禹的神格及治水传说的真实性

在癸公盃发现之前,基本可以认定为西周时期古籍文献的《尚书》《诗经》某些篇章屡有对大禹神格的记载。为进一步说明当时人们对大禹传说的“识记”,兹分别对以上文献中有关大禹传说的文字资料逐一进行细致的考察。

1. “禹平水土,主名山川”——《吕刑》中禹的身份

以前,学术界通常依据汉代《书序》,以《吕刑》为周穆王时期作品。经当代史学家研究,“《吕刑》只能是吕王之作”〔1〕,“成于西周‘申吕方强’时”〔2〕,因而是较为可信的西周文献。《吕刑》云:“皇帝清问下民……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种,农殖嘉谷。三后成功,惟殷于民。”其中,禹“主名山川”,杨筠如先生《尚书核诂》引《左传》襄公十一年云:“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群神群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国之祖,明神殛之,则名山川三字当连读,非命名之谓也。”〔3〕顾颉刚先生则进一步解释说:“‘主名山川’即‘为山川神主’。《夏本纪》云:‘于是天下皆宗禹之明度数声乐,为山川神主。’此即对于《吕刑》‘主名山川’之解说也。‘主’为‘神主’,则其指禹为名山大川之神可知。”〔4〕甚确。从以上文字可以看出,在西周时期的吕王看来,禹和伯夷、稷皆为上帝派来的天神,各司其职。当代史学家认为,“只是因为《吕刑》是吕国作品,是吕王之作,所以才把自己的祖宗放在夏族祖宗和姬姓祖宗的前面”〔5〕。撇开这一神话传说的不同来源,我们仍然可以清晰地获知,《吕刑》所记西周时期人们心目中禹的身份,确为山川之神。

2. “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商颂·长发》对大禹治水传说的追述

《诗经》被认为是西周、春秋时期的文献,历来学术界没有疑义。然而对于《商颂·长发》的制作年代的确定,学术界分歧较大。《诗序》说《长发》为“大禘”之诗,王国维先生疑《商颂》五篇乃“宗周时宋人所作”〔6〕,郭沫若先生进一步指出,《商颂》“是春秋宋襄公时正考父所作”〔7〕。值得注意的是,周代宋国贵族为殷人之后,《商颂》虽为春秋时期宋人拟作,但保留了许多殷商时期人们的“识记”。如《长发》中屡屡提及“帝立子生商”“帝命不违”“上帝是

〔1〕 顾颉刚、刘起钊:《尚书校释译论》第四册,中华书局,2005年,第2090页。

〔2〕 顾颉刚、刘起钊:《尚书校释译论》第四册,中华书局,2005年,第2095页。

〔3〕 杨筠如:《尚书核诂》,陕西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302页。

〔4〕 顾颉刚:《顾颉刚读书笔记》第六卷,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第4121页。

〔5〕 顾颉刚、刘起钊:《尚书校释译论》第四册,中华书局,2005年,第2088页。

〔6〕 王国维:《古史新证——王国维最后的讲义》,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页。

〔7〕 《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卷《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补记九·夏禹的问题》,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09页。

禘,帝命式于九围”,《玄鸟》中屡屡言及“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殷武》中屡言“天命多辟,设都于禹之绩”“天命降监,下民有严”,以上文字渗透着西周以来浓厚的天命思想,所以,学术界普遍认为,《长发》等诗篇中保存有不少较为真实的西周时代的历史信息。

《长发》记载:“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郭沫若先生以为,“所谓土方即是夏民族”,又云“‘禹敷下土方’当为禹受上帝之命下降于土方之国(即后之华夏、禹迹、禹甸、禹域),以敷治洪水”〔1〕。郭氏的解释大体不误,唯此“土方”是否即甲骨卜辞中的方国之名,或即夏民族,则疑问颇多。新发现的癸公盃铭文首句曰:“天令(命)禹尊(敷)土、陟山、𡵓(𡵓)川。”《禹贡》开篇亦云:“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禹敷下土方”之“方”,《集传》曰:“四方也。”很明显,“禹敷土方”与癸公盃铭文和《禹贡》中的“禹敷土”意义相同,即治理、平治水土。郭先生认为禹是受上帝之命来到人间,则较有道理。“天”和“下民”显然不在同一世界,由此可以推测,《长发》既言“禹敷下土方”,则禹并非来自“下民”中间,而应是奉帝之名从天上来到人间的神。《长发》在对大禹治水传说进行追述时,显然仍是将禹视为神灵的,认为他是奉天帝之命来到人间平治水土的。显然,从《长发》中的以上文字可以看出,尽管大禹治水的传说更加广为流传,但禹的身份仍然是神,而不具有人格。

3. 癸公盃铭对大禹治水传说的记述

癸公盃是迄今发现的有关大禹传说记载的最早的青铜器。自2002年癸公盃被保利艺术博物馆发现以后,已有不少学者对该盃的长篇铭文进行深入研究系统的研究〔2〕。该器铭文开篇明确提到:“天令(命)禹尊(敷)土、陟山、𡵓(𡵓)川”,这与《尚书·吕刑》《诗·商颂·长发》所载“禹平水土,主名山川”“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的记载颇为一致,不仅证明长期流传于民间的大禹治水的传说至迟于西周时期已在民间广为传播,同时也表明西周时期人们心目中的大禹尚不具有人格,而只是奉上帝之命来到人间治水的。由于癸公盃较之《诗经》《尚书》中的以上文字时代性更为明确,因此该盃铭文的发现,正可以对顾颉刚先生早年有关大禹传说的某些论断进行一次全面的检讨和有益的补正。

首先是大禹传说发生的时间问题。根据前文中《尚书·吕刑》《诗·商颂·长发》等文字并结合癸公盃铭文进行综合分析,则知大禹治水的传说至迟

〔1〕《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卷《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补记九·夏禹的问题》,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09页。

〔2〕李学勤:《论癸公盃及其重要意义》,《中国历史文物》2002年第6期;袁锡圭:《癸公盃铭文考释》,《中国历史文物》2002年第6期;朱凤瀚:《癸公盃铭文初释》,《中国历史文物》2002年第6期;李零:《癸公盃发现的意义》,《中国历史文物》2002年第6期。

于西周中期以前的确已经发生。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以上可以认定为西周时期的文献中有关大禹治水的记载表明,该传说最初发生的时代,未必恰就在西周中期,而可能起源更早,否则,不可能于西周中期该传说便一下子在民间广为传播。裘锡圭先生即曾指出:“虽然癸公盃恰好是西周中期器,但是这并不能成为指出顾氏‘禹是西周中期起来的’说法的证据。在此盃铸造的时代,禹的传说无疑已经是相当古老的被人们当作历史的一个传说了。不然,器主是决不会把禹的事写进一篇有明显教训意义的铭文,铸在准备传之子孙的铜器上。”〔1〕事实上,我们若反复推敲顾氏早年有关大禹传说发生的若干论断,则不难发现,目前学术界对顾氏的某些有价值的论断尚存在一些不小的误解。1923年2月,顾氏在致钱玄同先生的复函中,首次系统地公布了其著名的“层累说”,并谈到其对大禹传说发生的认识:“商族认为禹为下凡的天神,周族认禹为最古的人王,可见他们对于禹的观念,正与现在的人对于盘古的观念一样……禹是西周时就有的,尧、舜是春秋末年才起来的。”〔2〕1923年8月,顾氏就古史问题回答刘揆蓁、胡董人二先生的文中说:“禹是西周中期起来的,尧、舜是春秋后期起来的。”〔3〕综观顾氏的以上论断,则不难发现,顾氏在强调“商族认为禹为下凡的天神”的同时,也透露出大禹和大禹治水的传说并非始于西周中期,而是殷商时期商族中已有此传说;顾氏在未获得新的考古学资料作为支持的同时,实事求是地讲到“禹是西周中期起来的”,并非表明顾氏绝对肯定大禹和大禹治水的传说是自西周中期才开始发生的,他只是以西周中期为大禹治水“起来”的时间,这一点,目前的学术界似乎没有完全读明白。因此,笔者以为,《尚书·吕刑》《诗·商颂·长发》和癸公盃铭文中的文字资料不是对顾氏有关大禹治水传说发生时间论断的反证,而恰与顾先生的论断完全一致。

其次是西周时期大禹的身份问题。根据前文的分析,在《尚书·吕刑》《诗·商颂·长发》和癸公盃铭文中,禹均是受天命来到人间平治水土的,其尚不具有西周以后的充分的“人格”。顾颉刚先生在强调商族以禹为“下凡的天神”的同时,继续讲道:“西周中期,禹为山川之神;后来有了社祭,又为社神(后土)。”〔4〕顾先生的以上观点一度在学术界引起激烈的争论。1957年5月14日,徐旭生先生在其《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的序言中论及顾氏“层累说”提出后学术界的回应及其个人的观点:“1923年前后顾颉刚、刘揆蓁二先

〔1〕 裘锡圭:《新出土先秦文献与古史传说》,《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第4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2〕 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努力周报》附刊《读书杂志》第九期,1923年5月6日。

〔3〕 顾颉刚:《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书》,《努力周报》附刊《读书杂志》第十二期,1923年8月5日。

〔4〕 顾颉刚:《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书》,《努力周报》附刊《读书杂志》第十二期,1923年8月5日。

生,对于大禹是否天神,是否有实在的人格之讨论哄动一时……当时史学界的普通意见似有利于顾氏,可是我个人虽对于他的工作有较高的评价,却绝以为他走得太远,又复失真,所以颇不以他的结论为是。”〔1〕随着癸公盃的发现,顾氏早年的某些论断被学术界重新提出,并不断促使学术界对其作更为深入的思考。综合《尚书·吕刑》《商颂·长发》中的文字分析,顾说颇有一定的道理。裘锡圭先生结合癸公盃铭文说:“在较早的传说中,禹确是受天,即上帝之命来平治下界的水土的……与此盃铭文可以互证,顾颉刚的有关意见完全正确。”〔2〕受“走出疑古”学术思潮影响至深的部分学者则称“(癸)公盃铭文中的‘天命禹’……并不能作为禹是神而文王不是神的充要条件”〔3〕,并批评顾氏“在成见引导下做循环论证”〔4〕,似有矫枉过正之嫌。事实上,顾先生对西周时期大禹身份的论断,是颇为严谨的。1923年2月,顾氏在致钱玄同先生的复函中说:“商族认为禹为下凡的天神,周族认禹为最古的人王,可见他们对于禹的观念,正与现在的人对于盘古的观念一样。”〔5〕顾先生强调了商周之际,禹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而且这一变化于西周、春秋时期仍在继续:“其(禹)神职全在土地上,故其神迹从全体上说,为铺地,陈列山川,治洪水;从农事上说,为治沟洫,事耕稼。耕稼与后稷的事业混淆,而在事实上必先有了土地然后可兴农事,易引起禹的耕稼先于稷的观念,故《閼宫》有后稷赞禹之绪的话。又因当时神人的界限不甚分清,禹又与周族的祖先并称,故禹的传说渐渐倾向于‘人王’方面,而与神话脱离。”〔6〕又说:“到鲁僖公时,禹确是人了。”〔7〕顾先生一方面认为在西周时期大禹具有山川之神和社神的典型神格,同时又承认西周以后,大禹逐渐完成了由神到人的身份的转变。由此可见,顾氏并非绝对地打击禹的人格,片面强调禹的神格。不唯如此,《尚书·洪范》〔8〕云:“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国语·鲁语

〔1〕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修订本)序,科学出版社,1960年。

〔2〕 裘锡圭:《新出土先秦文献与古史传说》,《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第4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3〕 李锐:《由新出土文献重评顾颉刚先生的“层累说”》,《人文杂志》2008年第6期。

〔4〕 李锐:《由新出土文献重评顾颉刚先生的“层累说”》,《人文杂志》2008年第6期。

〔5〕 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努力周报》附刊《读书杂志》第九期,1923年5月6日。

〔6〕 顾颉刚:《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书》,《努力周报》附刊《读书杂志》第十二期,1923年8月5日。

〔7〕 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努力周报》附刊《读书杂志》第九期,1923年5月6日。

〔8〕 对于《洪范》的制作年代,学术界尚存在较大争议。王国维先生以为在周初,刘起钊先生认为当西周时期,杜勇先生以为当春秋时期,郭沫若先生更以为在战国时期,刘节先生更以为当战国末年。参见王国维:《古史新证——王国维最后的讲义》,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刘起钊:《〈洪范〉成书时代考》,《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3期;杜勇:《〈洪范〉制作年代新探》,《人文杂志》1995年第3期;《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二卷《十批判书》,人民出版社,1982年;刘节:《〈洪范〉疏证》,《东方杂志》第二十五卷第二期,1928年1月。笔者以为,西周略早,战国略晚,其更大可能为春秋时期文献。

下》云：“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显然到《尚书·洪范》《国语·鲁语》成书时，在当时人们心目中，大禹的形象仍是半神半人。显然，就西周、春秋时期大禹身份的问题，顾先生的见解显然比试图对极端疑古学派错疑所不应疑的学术倾向进行“纠偏”和“走出疑古”过远的学者们，更具有科学、理性的因素。

第三，大禹治水传说发生的地域和《禹贡》制作时代问题。随着考古学资料的日渐丰富和古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大禹治水传说的真实性已经基本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近年来，山西襄汾陶寺、河南辉县孟庄等龙山时代的城址中，相继发现洪水泛滥留下来的痕迹。有的学者认为，陶寺遗址的废弃可能与洪水泛滥有关。^{〔1〕}有的学者认为孟庄龙山城址在龙山文化晚期至二里头时期以前毁于洪水的迹象十分明显。^{〔2〕}在黄河下游的平原地区，距今4000多年的龙山时代的遗址多位于高于周围数米的人工堆筑的“堦堆”之上，“显然是为了防御洪水的危害”^{〔3〕}。考古学资料进一步表明，龙山文化晚期洪水发生的地域具有一定的广泛性，不仅黄河流域，而且包括淮河流域乃至长江流域均有洪水发生的考古学证据。有的学者认为，长江中下游流经的地区，居民多居住于平原地区，洪水带来的危害远甚于黄河中游地区。低温、洪涝等自然灾害的频发，地下水位的上涨，使长江流域相当繁盛的稻作农业遭到毁灭性打击，可能是长江流域文明化进程遭到挫折的重要原因之一。^{〔4〕}很显然，龙山文化晚期，全国范围内如此普遍的洪水传说正是西周以来大禹治水传说发生的深厚土壤。顾先生云：“禹是南方民族神话中的人物……商、周间，南方的新民族有平水土的需要，酝酿为禹的神话。这个神话的中心点在越（会稽）；越人奉禹为祖先。自越传至群舒（涂山），自群舒传至楚，自楚传至中原。流播的地域既广，遂看得禹的平水土是极普遍的。”^{〔5〕}顾氏又说：“禹的故事最有名的两个地方是涂山与会稽。涂山在淮河旁，淮河的水患至今依然。会稽在浙东，浙东以山多之故，时发山洪……所以两地尽可都有洪水的传说……禹的故事所以能由越、舒流传至中原，亦因中原有黄河的水患，有求得一水神（或一个有治水的大神通之人）之需要，恰由越、舒传了一个禹来，于是就十分的信奉了。《周颂》没有禹，决是禹不出于中原的一个重要证据……我以为《禹贡》作于战国，不过是战国时人把当地的地域作一整理而托

〔1〕 梁星鹏、严志斌：《陶寺城址的发现及其对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研究的学术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2002年第3期。

〔2〕 袁广阔：《关于孟庄龙山城址毁因的思考》，《考古》2000年第3期。

〔3〕 王巍：《公元前2000年前后我国大范围文化变化原因探讨》，《考古》2004年第1期。

〔4〕 王巍：《公元前2000年前后我国大范围文化变化原因探讨》，《考古》2004年第1期。

〔5〕 顾颉刚：《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书》，《努力周报》附刊《读书杂志》第十二期，1923年8月5日。

之于禹迹,原无意义可循,不必为之讲通。”〔1〕在我们今天看来,顾先生“禹是南方民族神话中的人物”和大禹治水的神话“自越传至群舒(涂山),自群舒传至楚,自楚传至中原”“《周颂》没有禹,决是禹不出于中原的一个重要证据”等论断,的确证据略显薄弱,值得学术界进一步思考,但其根据越、舒等地普遍存在大禹治水的故事,从而推断“禹的平水土是极普遍的”,“《禹贡》作于战国,不过是战国时人把当地的地域作一整理而托之于禹迹”,则确至为精当。近年来有的学者据夔公盨铭文中禹平治水土的传说,重申王国维〔2〕、辛树帜先生〔3〕当年提出的《禹贡》成书于西周中期说〔4〕。事实上,仅仅以夔公盨铭文“天令(命)禹敷(敷)土、陟山、𡔷(𡔷)川”与《禹贡》“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文字的雷同为据,推断《禹贡》成书于西周中期,疑点是比较多的。就目前所掌握的西周时期的文献和金文资料,包括夔公盨铭文,均难以找到《禹贡》中九州之制和五服之制的影子,显然,《禹贡》的成书年代必然在禹画九州的传说发生之后。

这里还应说明的是,《吕刑》中包含有浓厚的“明德慎罚”的思想:“齔寡有辞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夔公盨铭文更以大量文字叙说了大禹治水“为政以德”之事。从《尚书》的《康诰》《君奭》《梓材》《召诰》及西周青铜器班簋、大盂鼎铭文可知,敬德思想“是周人所独有的思想”〔5〕。由此可知,西周时期所谓大禹治水“为政以德”的论述,显然是后起的传说,西周以前的人们不可能有此观念。

二、春秋时期大禹由神格向人格的转化及大禹传说的丰富扩大

文献和考古学材料表明,春秋时期有关大禹的传说日渐丰富。除了王国维先生所举《秦侯敦(簋)》《齐侯钟》提到禹之外,《诗经》《论语》《左传》《国语》等文献中均有有关禹的记载。综合各种传说,不难发现,春秋时期大禹逐渐完成了由神到人的关键性转变,同时,在西周大禹治水传说的基础上,大禹的事迹更为丰富。

1. 大禹身份由“山川神主”向“夏宗”和“人王”的转变

综合春秋时期的各种传说,不难发现,在此阶段,大禹的身份已完成了由西周时期的“山川神主”向“夏宗”和“人王”角色的转换。一方面,大禹治水的

〔1〕 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209—210页。

〔2〕 王国维:《古史新证——王国维最后的讲义》,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页。

〔3〕 辛树帜:《禹贡制作时代的推测(初稿)》,《西北农学院学报》1957年第3期。

〔4〕 岳红琴:《禹贡成书于西周中期说》,《学海》2006年第2期;岳红琴:《禹贡成书时代考》,《图书与情报》2006年第5期;岳红琴:《夔公盨与禹贡成书时代》,《中原文物》2009年第3期。

〔5〕 《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卷《青铜时代·先秦天道观之进展》,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35页。

传说继续流传并逐步被时人认定为“信史”。如《左传》昭公元年记载：“天王使刘定公劳赵孟于潁，馆于洛汭。刘子曰：‘美哉禹功！明德远矣。微禹，吾其鱼乎！’”《国语·郑语》说：“夏禹能单平水土，以品处庶类者也。”《国语·周语下》则历叙鲧、禹史迹：“其在有虞，有崇伯鲧，播其淫心，称遂共工之过，尧用殛之于羽山。其后伯禹念前之非度，厘改制量，象物天地，比类百则，仪之于民，而度之于群生，共之从孙四岳佐之，高高下下，疏川导滞，钟水丰物，封崇九山，决汨九川，陂障九泽，丰殖九藪，汨越九原，宅居九隩，合通四海，故天无伏阴，地无散阳，水无沈气，火无灾燂，神无间行，民无淫心，时无逆数，物无害生，帅象禹之功，度之于轨仪，莫非嘉绩，克厌帝心。皇天嘉之，祚以天下，赐姓曰‘姒’、氏曰‘有夏’，谓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祚四岳国，命以侯伯，赐姓曰‘姜’、氏曰‘有吕’，谓其能为禹股肱心膂，以养物丰民人也。”《国语·周语下》和《郑语》不仅将大禹治水的传说进一步丰富，而且开始逐步“明确”鲧、禹与夏的关系。《国语·鲁语上》则更进一步为传说的黄帝、颛顼、鲧、禹“建立”起同出一源的“家谱”：“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以后这种传说继续流传，到战国时期，《礼记·祭法》沿用了春秋时期人们的传说：“夏后氏亦禘黄帝而郊鲧，祖颛顼而宗禹。”由此可见，至迟于春秋时期，这一观念已基本形成。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郭沫若先生即据文献和考古学资料纠正了顾先生早年提出的“禹和夏没有关系”〔1〕的推论，明确指出：“在春秋时代一般人之信念中，确承认商之前有夏，而禹为夏之先祖”〔2〕，“禹与夏就文献中所见者确有关系，此必为夏民族之传说人物，可无疑”〔3〕。

除了治水传说外，春秋时期禹的“人王”身份日渐定型。《诗·鲁颂·閟宫》说：“后稷……奄有下土，缙禹之绪。”《论语·宪问》《论语·泰伯》则分别有“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和“禹……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的记载。顾颉刚先生讲到春秋大禹的身份：“到鲁僖公时，禹确是人”〔4〕，“《鲁颂·閟宫》……把他看作一个最早的人王……《论语》……把他看作一个耕稼的人王”〔5〕。从以上文字可以看出，春秋时期，大禹身份不仅完成了由“山川神主”向“人王”的变化，神格逐渐淡化，人格日益突出，而且他的“事迹”不再局限于平治水土，开始与“躬稼”相联系，摇身变成了一个“耕稼的人王”，显然，于大禹传说流变过程中，人们不断将后起的

〔1〕 顾颉刚：《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书》，《努力周报》附刊《读书杂志》第十二期，1923年8月5日。

〔2〕 《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卷《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补记九·夏禹的问题》，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06页。

〔3〕 《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卷《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补记九·夏禹的问题》，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09页。

〔4〕 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努力周报》附刊《读书杂志》第九期，1923年5月6日。

〔5〕 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52页。

传说迭相添加,层层累积。顾先生对春秋时期大禹身份的转变如是分析:“西周中期,禹为山川之神;后来有了社祭,又为社神(后土)。其神职全在土地上,故其神迹从全体上说,为铺地,陈列山川,治洪水;从农事上说,为治沟洫,事耕稼。耕稼与后稷的事业混淆,而在事实上必先有了土地然后可兴农事,易引起禹的耕稼先于稷的观念,故《閼宫》有后稷纘禹之绪的话。又因当时神人的界限不甚分清,禹又与周族的祖先并称,故禹的传说渐渐倾向于‘人王’方面,而与神话脱离。”〔1〕这一转变到战国时期仍在继续。《韩非子·五蠹》说:“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耜以为民先,股无胈,胫不生毛。”综合以上文字,则知顾先生的以上分析,极有道理。

2. “禹画九州”传说的发生及其衍变

《左传》襄公四年引《虞人之箴》谓:“芒芒禹迹,画为九州,经启九道。”《国语·周语下》记周灵王二十二年,太子晋论禹治水之事说:“封崇九山,决汨九川,陂障九泽,丰殖九藪,汨越九原,宅居九隩,合通四海。”这是有关禹画九州的最早记载。以后,《尚书·禹贡》《周礼·职方》及《吕氏春秋·有始》《尔雅·释地》及新出上博简《容成氏》等先秦、秦汉时期的文献皆有九州具体名称,尤其是《禹贡》九州数千年来长期被学术界认为即禹所规划的九州。随着考古学和古史研究的深入,迄今为止,已经很少有人再将《禹贡》九州和禹画九州相联系,但还是有不少学者仍然确信“禹画九州,这个基本事实,是可信的”〔2〕,甚至仍有人继续相信《禹贡》九州即大禹所规划的九州〔3〕。因禹画九州的传说为本文所讨论的重要内容之一,故不得不继续探讨。

先秦时期的文献和考古学材料表明,九州概念至迟于春秋时期已经发生。春秋时期齐灵公时期的青铜器《齐侯铸钟》铭文论及成汤“有严在帝所,咸有九州,处禹之都”。此外,《诗·商颂》中的“九有”“九围”,《国语·鲁语》中的“九土”,历代注疏家均释为“九州”。《商颂》五篇据《史记·宋世家》说是宋襄公时的作品,则九州的概念至迟于春秋时期已经发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上博楚简《容成氏》谈到大禹治水及划分九州的事情,其中所述九州的名称和地域范围与《禹贡》等传世文献所记不同,是一个独立的系统。有的学者以为竹书反映的九州在禹治水前即已存在〔4〕,也有学者认为上博楚简《容成

〔1〕 顾颉刚:《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书》,《努力周报》附刊《读书杂志》第十二期,1923年8月5日。

〔2〕 金景芳:《中国奴隶社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7页。

〔3〕 邵望平:《〈禹贡〉九州的考古学研究》,《考古学文化论集》(二),文物出版社,1989年;陈剩勇:《九州新解》,《东南文化》1995年第4期;朱渊清:《禹画九州论》,北京大学考古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古代文明》(第5卷),文物出版社,2006年。

〔4〕 陈伟:《竹书容成氏所见的九州》,《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3期。